

文献信息资源研究

主编 左新华 李士竹

石油工业出版社

《文献信息资源研究》编委会

主 编：左新华 李士竹

副主编：杨德林 高 虎 常 飞 李 林

编 委：杨德林 高 虎 常 飞 李 林

邵志山 任慧琼 纪 琳 张 燕

田绍臣 陈养龙 游志明 贾振尧

序 言

《文献信息资源研究》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辛勤工作在图书档案系统的广大科技人员长期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展示了大型企业图书与档案管理领域面对网络及信息化挑战的全新认识，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 从建设国有大型企业先进文化的高度，重新认识“两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图书馆与档案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机构，从它出现之日起，就把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承文明、传播知识作为基本职能之一。进入 20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全球信息量的快速增长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计算机技术、光盘技术和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已在“两馆”的工作和服务领域中广泛应用，使其在服务方式和结构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图书期刊及档案的管理工作，必须进行全新的调整，才能适应现代化、网络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图书馆与档案馆是代表企业文化较丰富的事业单位，是企业各方面信息的枢纽与集散地，企业方方面面的工作都与“两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图书馆和档案馆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不断的学习与研究，不但可使馆内员工成为本行业的专家，而且一些同志还可成为信息研究专家、咨询专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两馆”又可成为应用高新技术越来越广泛的文化部门，“两馆”的发展方向 and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从建设企业先进文化的高度，重新认识“两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建设数字图书馆和档案

馆是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加快企业信息化步伐的需要。

2. 建设数字图书馆与档案馆的核心是资源建设

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中，信息资源已成为继能源之后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其实质是人类通过创造、搜集、积累、传播而形成的一种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因此，对信息资源的占用量和利用率，已成为衡量大到国家小到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本”。信息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资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中原油田刘恩学局长、王献安书记等领导对油田信息化建设做出多次重要指示，刘恩学局长在油田2001年工作报告中指出：“适应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要求，要认真研究国家信息产业的有关政策，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发网络资源……不断满足油田和职工对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企业信息化建设中，要把资源建设摆在应有的核心地位，正确处理“路、车、货”的关系问题，“路”就是网络；“车”就是计算机软硬件；“货”就是信息资源库。开发图书与档案资源在网上实现分级查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网络建设的重要内容。

3. “两馆”工作重心要转到资源开发及咨询服务上来

21世纪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将更加重视高附加值的服务，评价一个馆员是否优秀，不再仅看其提供了多少次服务，而是看其解决了多少问题，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做了多少有附加值的服务工作。而“两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从文献单元过渡到信息单元、知识单元上来。要借助计算机技术，将文本、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表达形式有效地组织起来，使读者从文献的不同节点，从一、二、三次信息和知识的不同层面中完成各种意义上的“获取”。

企业图书馆和档案馆要综合分析各方面信息，借助网络开展下列新型的高品位服务：(1) 联网电子邮件；(2) 电子公告；(3) 根据读者要求提供多媒体的学习辅导及参考文献；(4) 为读者开发特定信息包；(5) 应读者要求加工并提供知识单元型、全文型、综述型、研究分析型的信息；(6) 为读者提供联网信息检索、咨询服务；(7) 为读者提供联网过程数据库信息与软件信息登录服务等。

本书在总结分析现阶段文献信息资源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全方位总结了“两馆”从业人员多年的工作经验，并对图书馆、档案馆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很好的设想，对改进图书馆及档案馆的管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左新华

2001 年 10 月

目 录

我国古代的藏书与教育	常 飞	李 林 (1)
企业图书馆为领导决策服务之我见	唐金鸽	(13)
加强采访工作, 保证馆藏质量	任慧琼	(17)
外文期刊信息开发中的问题及对策	任慧琼	张彩霞 (20)
信息技术时代图书馆的发展	任慧琼 常丽芳	吕 强 (24)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及图书馆员的角色转变	叶长青	(28)
我馆电子阅览室的建设与发展	赵 瑾	(33)
网络环境下的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共享	纪 琳	(37)
如何提高馆藏文献利用率之我见	纪 琳	(42)
浅谈馆际协作	纪 琳 张彩霞	张青平 (47)
浅析图书馆读者到馆量下降的原因及对策	梁绍敏	(52)
我馆期刊装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梁绍敏	(55)
知识信息时代图书馆员的素质培养	梁绍敏	(57)
如何发挥图书馆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柯善珍	(61)
21 世纪图书馆工作	柯善珍	(65)
如何加强图书馆藏书的保护	杨丽萍	(69)
试论数字图书馆对馆员素质的要求	杨丽萍	(74)
浅谈图书馆信息人员的素质培养	杨德林	(78)
Internet 及其信息资源的开发	杨德林 王爱芳	李 林 (81)
图书馆参与信息市场、开发信息产品之设想	成 燕 张 燕	李 林 (87)
报纸阅览室的管理与实践	孙庆瑞	(90)
中原油田图书馆自动化网络管理系统的发展历程及未来展望	何 丽	(94)
图书馆书目数据库建设与安全管理	何 丽	(99)
条形码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	何 丽	(104)

谈新世纪企业图书馆如何为油田生产科研服务	高 虎 (107)
论中原油田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	高 虎 (110)
图书馆工作者与读者关系论	常 飞 (113)
网络环境下传统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	张 燕 张彩霞 郑玉蓉 (119)
现代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的影响	王琰玮 (123)
浅析信息时代油田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	陈玉梅 (126)
论油田图书馆信息环境的营造	陈玉梅 (130)
用活馆藏文献, 深化社会服务	海 琦 (134)
浅议核心期刊的确定、收集与开发	海 琦 (137)
浅谈中原油田图书馆图书修复的措施	海 琦 卢 艺 (140)
谈中原油田图书馆报刊的装订工作	朱二开 (143)
图书馆的藏书管理	王红真 (147)
深化科技文献改革, 为油田经济建设服务	冯霄翔 (150)
图书馆藏书剔除之我见	冯霄翔 (153)
期刊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浅议	卢 艺 邢淑芹 (155)
IT 期刊的发展方向	邢淑芹 卢 艺 (158)
当代实用信息收集的几种方法	李 林 (160)
网络建设与信息资源开发	喻洪春 (165)
人力资源信息在工作中的应用	赵卫东 (168)
对中原油田图书馆提高服务质量之我见	张建华 (172)
图书馆信息服务新对策	李丽群 (175)
浅谈中原油田图书馆藏书建设	王 冰 (178)
中原油田图书馆如何开办少儿图书室	王 冰 (181)
新形势下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的新思考	韩小燕 (184)
掌握读者心理 提高服务质量	冯玉红 (188)
网络环境下数字化图书馆前瞻	张晓珍 (191)
谈石油企业图书馆网页制作	张彩霞 李素清 (194)
论信息人员的素质	于志杰 (197)
论信息产品的市场营销	于志杰 (200)
知识经济与图书馆读者教育	汤淑蓉 (204)

经济体制改革中科技图书馆的自我发展之路

..... 张 峻 张建丽 简本君 (207)	
石化院校图书馆采访工作的思考	王向东 (210)
信息时代与图书馆的发展	王向东 王 凯 (214)
浅议新形势下图书馆人员的继续教育	王思峰 (218)
网络环境下的文献资源建设	郑玉蓉 王思峰 陈凌全 (222)
报纸新闻采编系统的网络安全技术	孔自非 (225)
谈 21 世纪家庭教育中的导读	唐爱平 (229)
浅谈基层图书馆如何为科技服务	马兆武 王 峰 (232)
图书情报学与网络教育	丁丽萍 (239)
图书馆的困境与出路	石美清 (242)
图书馆转型与图书馆员角色的转换	杨清华 (246)
全民读书与图书馆工作	孙明英 (249)
读者人数下降及其对策	孙彩芳 (252)
新世纪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王亚萍 (256)
浅谈公共图书馆的农业信息服务	安相琴 (260)
二十一世纪: 知识经济与企业档案工作	李士竹 邵志山 (264)
关于网络时代档案馆应对策略的探讨	李 伟 (269)
浅析网络时代档案馆的应对策略	柏 燕 周 荣 (272)
网络时代档案馆的应对策略	王军妮 (275)
档案信息化管理之我见	刘春华 (277)
以创新迎接知识经济对档案工作的挑战	康兰川 孙安业 (279)
档案工作者要以创新的精神迎接新世纪挑战	刘庆良 胡 坤 (281)
论 21 世纪档案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	范朝霞 (285)
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档案工作	蔡海珍 路 卫 (288)
新世纪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田巧玲 王桂莲 (291)
如何做好企业档案室工作	王新霞 (293)
企业重组改制后如何提高档案管理水平	宋 彦 (296)
对当前油田档案工作的几点思考	马祥英 张伟丽 (299)
中原油田人事档案系统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苏照林 (301)

新形势下企业人事档案工作的改革	宋红卫	(304)
关于国有企业档案资产评估的探讨	齐红玉 李海珍	(308)
企业档案部门如何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王宝钧	(312)
学校档案管理中教学档案与其它档案的区别	孙丽萍	栾维亚 (315)
应做好基建工程竣工档案的归档工作	张英	(318)
试论档案管理现代化	宦立珍	(320)
跟上计算机管理档案的新步伐	王维花	(323)
档案专业网站建设初探	逄海燕	娄美 (325)
浅析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电子档案管理	殷秀珍	(328)
企业电子文件管理之我见	张伟丽	马祥英 (331)
电子文件管理刍议	张萍	(335)
电子文件的证据价值初探	程林	王辉 (337)
论电子文件的特征与鉴定	何汝杰	(341)
如何保证电子文件的信息安全	李军	张敏杰 (344)
浅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档案馆的信息服务工作	任宪荣	(348)
围绕企业名牌战略搞好档案服务	余高红	(352)
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企业办好中介服务	胡玉琴	(356)
新世纪企业档案利用特点的比较分析	高丽华	(358)
试论档案的利用价值与档案利用率	刘春霞	(362)
关于提高企业档案利用率的几点做法	符慧萍	(365)
提高企业档案利用效率 开发企业档案资源	徐玘	孙安业 (367)
试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	汪中华	(370)
浅谈企业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孙艳丽	孟秀丽 (373)
论如何搞好企业档案服务	刘春华	王军妮 (375)
当前企业档案编研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毛金红	(377)
加快档案科技创新步伐之我见	顾清华	门双华 (380)
谈科技档案的经济效益	田巧玲	刘素红 (384)
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档案工作	何坤玲	王建玲 (387)

我国古代的藏书与教育

常 飞 李 林

教育是和人类社会同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图书又是随着文字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有了图书，随之也有了藏书活动。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藏书。一般来说，我国古代的藏书机构也是社会的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直接从事教育活动。尤其到了春秋以后，藏书成了国家的一项重要文化措施，成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量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从藏书活动出现的第一天起，它就担负着教育的责任，教育活动是我国古代藏书的一项主要功能。因此，教育职能是历史遗留给图书馆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完成这一使命就是每一个图书馆工作者的神圣义务。但是，藏书的教育活动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从成熟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本文就是想通过史料的记载，来回顾一下我国古代藏书教育职能的发生和发展情况。

1 传说时代的藏书与教育

传说时代又称为上古时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上古的历史尚无实物考证，但在不少的典籍中却有着大量关于上古传说的记载。这些传说，在文字出现以前完全是依靠口耳相传的方法代代流传下来的，在文字出现以后，除口耳相传方法以外，又借助大量文籍的记载传播于后世，只是由于时代久远和当时生产技术的低下，使这些典籍未能保存至今，或者还未被发现。但可以肯定，这些文籍总要流传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所以，尽管这些传说经过后人加工，但还是具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在文字出现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记忆的东西。所以，人们仅仅是通过语言，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来交流思想，表达感情，进行教育。随着社会和生产不断向前发展，当用这种方法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时候，人们便借助结绳、刻划这样一些最简单的方法来帮助记忆和交流思想感情，进行教育。古人称之为“结绳之政”。无疑，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象征。

相传到了六七千年前的时候，母系氏族公社开始进入繁荣阶段，出现了文字，萌芽状态的典籍也随之而产生。《尚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唐书续《墨数·五十六种书》也记载说：“自三皇以前，结绳为政，至太昊氏，文字生焉。”太昊氏即伏羲氏。古人认为，“八卦”是中国“文籍”之始，也就是中国最早具有文字性质的

符号。所谓“卦”者，象也，悬卦物象以示于人。《尸子》记载：“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从这些历史的记载中都可以看出，我国早在殷周之前就已经有了“文籍”的收藏和流传，并用这种“文籍”对民实施教育。这种“文籍”也就是最早具有图书性质的典册。可以想见，“藏书”与“文字”大体上也是同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有了文字也便有了藏书活动，故称之为“文籍”。

大约到了四五千年前的时候，我国原始社会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也说是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农牧业得到发展，创建了木耒，铜石器并用，并有冶金术。这时的人们相信鬼神世界，因此，迷信鬼神，崇拜祖先，占卜术流行，有了掌握一定文化的“巫”，而且陆续出现了歌谣、谚语、故事、游戏、舞蹈和雕刻，已经开始出现脱离生产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就在这一时期，随着文字的不断改进和发展，又出现了一种称为“书契”的契刻文字。《尚书·序》云：“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随书·经籍志》也说：“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说文解字·叙》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 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盖取诸 。”魏晋时的皇甫谧说：“黄帝使仓颉造文字，记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这种“书契”就是最原始具有典籍性质的简策。据考古资料，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陶器上的二十多种刻划符号、龙山文体时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原始象形符号等，都是比甲骨文更原始、更简单的契刻文字。

以上记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不仅文字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有了藏书活动，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也比较发达。养蚕、舟车、音律、医学、算术等均始创于黄帝时代，同时还可以看出，自从有了文字，文化知识更丰富，学习条件更加便利，它使教育发生了第一次飞跃，从而产生了传授和学习文化知识的机构。文字的出现，必然就要求有记录文字的物质载体，从而产生了典籍。于是藏书活动也就随典籍的产生而产生，随典籍的发展而发展。这时的典籍已不单单是为了帮助人们记忆，更主要的是为了保存以供查阅，并成为进行教育的重要工具，典籍的创造者和掌管者，也就成了教育者。从而又将教育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传说时代，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所以，这一时期的教育没有阶级性，就是为生产斗争、为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服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传授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社会生活常识。

2 奴隶制时代的藏书与教育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我国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禹夏王朝。这时，生产技术又有大幅度提高，文化又有更大发展。藏书规模进一步扩大。《吕氏时期·先识览》中说：“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以谏桀，乃出奔如商。”这至少可以说明夏朝已有了比较像样的典册及其收藏，藏书也促进了教育

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礼记·王制》记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注云：“东序，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小学，在西郊。”）不仅有学校，而且已有了专门管理教育的学官。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我国的文字也日趋完善，数量不断增多。到殷周时代已约有汉字四千个左右。这时甲骨文的造字原则基本符合“六书”，语法也与后世相差不多，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了。在这一时期，尤其殷人迷信鬼神，重祭祀，崇礼乐，无事不卜。于是便将王事、农作、疾病、田猎、出入、征战、祭祀活动、鬼神占卜以及与占卜有关的事情统统用文字记录在龟甲、兽骨和竹木简上。为了便于事后的查考与验证，将它们装联成册，并长期保存。这在墟殷出土的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中多次发现“典”、“册”的象形字便是最好的证明。而且这些甲骨之收藏是按照一定次序集中存放的，有几个朝代的甲骨集中于一个窖穴，也有一个朝代的甲骨存放于一个窖穴中的。这又说明殷商藏书事业之兴旺。因此，《尚书》中武王对殷民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些事实全证明，典籍中的有关记载决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臆造。这一时期藏书之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查考与验证，更主要的是用来对民进行教育。从而又将教育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殷墟考古发现的大批甲骨文“卜辞”可以证明，商朝的教育比较普遍，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但是，商代的教育都是结合在政治、军事、宗教的活动之中进行的，专门文化知识的教育尚未分化出来。

周朝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统治者在思想意识上由重鬼神逐渐转变为重人事。因此，对文化教育活动极端重视，并实行高度垄断，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周代的教育是政教一体、官师合一的，典章文物藏书于秘府，由专官执掌。藏书范围十分广泛，除前朝典籍、当朝各种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用于教学的三德、三行、六礼、六仪、六艺、七教、八政、乡三物以及乐德、乐语之书，实际上就是教师讲学之课本。教师由官吏兼任，史官首当其冲。这个时期，专门文化知识的教育开始从一般的教育活动中分化出来。据史料记载，周时所使用文字叫“籀文”。周宣王（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时已有了专门教授学生的识字课本《史籀篇》。元郑杓《衍极》卷一《至朴篇》刘有定注：“周宣王柱下史籀为《大篆》十五篇，以其名显故谓之‘籀书’；以其官名，故《汉书》谓之‘史书’。”因其易见首句为“太史籀书”，故称之为《史籀篇》。显而易见，此书为史官所作，也是“当时史官教授学童之字书，系当时厘定文字之著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隐》说：“藏室史，周藏室之史也”。清周永年说：“老子为柱下守藏史，故周人藏书之官也。”这些历史的记载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柱下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馆馆长，是当时的史官之一。老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利用管理藏书的优越条件，进行著述，言道德之意，经后人积累和整理，撰成

《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共计五千余言。虽《老子》的思想基础属于消极的客观唯心主义，但它确包含着某些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反映着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成分，对我国哲学的发展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根据史料记载可知，在上古社会里，文化学术“统于王室”，然而却没有专门的文化教育管理机构，文化教育的职责是由学校和藏书机构共同承担的。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则是王室里众多的官吏和专门从事文化、宗教活动的史官，其中史官又是文化教育活动的主力军。关于史官，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是黄帝之左史仓颉与右史沮诵同创文字。到了商朝，史官分为两大部分，一种是主掌鬼神之事的“巫”，称为“卜”和“贞”；一种是主掌人事、王事的“史”，称为“作册”和“御史”。而周朝史官不再有“巫”，但分工更加细密，他们既司人事，又司鬼事；故占候星历，预卜吉凶，祭祀天地，均为其责。《隋书·经籍志》说：“史官即既立，经籍于是兴焉。”这也足以说明，有了史官就是史官藏书。史官不仅制造和保藏典籍，而且负有教育的职责。

由此可知，史官是一种文化性质的官员，从事王朝内外一切文化活动，记言记事，撰写与整理王朝的史料，辅帮政治事务之处理，传达王室的命令和文告，收藏和管理各类典籍，从事教育活动。实际上，他们是一批创造并垄断文化财富的人，既是藏书的实施者，又是文化教育者。这一时期的藏书机构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教育的管理机构。很明显，这一时期的藏书是奴隶主贵族实行统治的工具。

3 古代的私人藏书与教育

私人藏书与私学教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我国私人藏书和私学始创于春秋。这一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逐步推广，水利灌溉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各诸侯国力量日渐强盛，天子权力大大削弱。而“士”阶层的出现，使藏书统于王室的局面彻底被打破，从而产生了“学术下于私人”的局面，于是出现了私人藏书。《尚书·正义》卷一记载：“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论语》、《孝经》。”便是很好的例证。虽当时在文化教育上官学衰落，但私人藏书却促进了私学的兴起。《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从而促进了我国文化学术的发展。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广泛搜集鲁国、宋国及周王室的典籍。《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徐彦疏：“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并对其进行整理和编修，成为收藏和整理典籍最著名的人物。《史能·六家》称：“《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这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篇。”并用以

教授门徒。同时，孔子又是我国私人办学的创始人，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者。他十分重视对民教育，兴教学，授六艺，主张“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把教育对象扩大到下层平民。不论什么人，只要带上一束干肉以上的礼品便可成为孔子的学生。《论语·述而》中孔子说：“自行束 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史料记载，当时孔子有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孔子认为，教师必须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教师以身作则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孔子还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这里，孔子认为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要发展经济使其富足，然后还必须加强教育，提高文化，使民众有坚定的信念和信心，这才是立国之本。而在教育之中，更重要的又是道德教育。孔子主张，一般的文化知识学习要服从道德教育的需要。《论语·述而》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首先强调的是立志，就是要确立远大的理想。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还认为，文化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工作，通过文化教育可把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传播于民众之中，就会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意思是说，通过教育工作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传播开来，就会影响政治。这说明自古以来教育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孔子的这些思想对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作用，不仅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而且很多教育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基本建立，在文化学术上出现了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私人藏书大量涌现。《墨子》一书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庄子·天下篇》记载庄子的藏书：“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陈籥数十，得太公阴谋之谋”。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私藏之广和私藏之多。而且不仅藏书，更主要的是利用藏书进行著述立说、招收门徒、讲学论道等教育活动，阐述各自的学术见解和政治主张，宣传介绍前人的先进技术和学术成果以及整理先代遗文，用以影响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论语》、《墨子》、《孟子》、《管子》、《吕氏春秋》等都是当时私人教学活动的言行录。同时还编著了《大学》、《中庸》、《弟子职》和《学记》等许多教育专著，总结了一套教育和教学的原则方法。无疑，这些私人藏书和私学成为当时教育事业的主力军，在这些活动中涌现了大批优秀人物。

墨子，《淮南子·要略》记载：“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遂“弃周道而用夏政”。于是

另立学派，聚徒讲学，弟子很多，与儒家的孔子私学并称为“显学”。《墨子·贵义》说：“予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说明也是一位藏书家。在教学上他主张送教上门和“述而且作”的创造精神，特别注意意志和道德的锻炼。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成为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的世界观虽属唯心主义，但其学说却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他用三表法论证了不少唯物主义命题，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

孟子，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号称“亚圣”。广聚门徒游说列国，推行其政治主张。《盐铁论·论儒篇》说孟子游说列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晚年专心著述和讲学，是战国时期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民贵君轻”说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点，这为儒家思想增添了新的光彩。但他又提倡天命论，鼓吹唯心主义先验论，成为后代儒家唯心主义哲学的开山，对唐宋儒学影响很大。孟子在教育 and 教学上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即使今天也很有借鉴价值。这里只提一点，就是他十分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和教育在人生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只要接受教育，肯于学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他和孔子一样，把道德教育放在整个教育的首位。而在道德教育中，他首先强调持志养气，现在人们所说的“志气”即由此而来。“志”即志向，属于理智活动；“气”多指人的意念或情绪。《孟子·公孙丑上》说：“志，气之帅也。”“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这是说志统帅着气，而气对志又有反作用；其次是强调自我修养，道德修养贵在自觉，特别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就是要自我反省、自我监督，并要有客观正确的自我评价；第三是改过迁善，虚心学习别人之长，认真改正自己之短；第四是刻苦锻炼，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种为了正义事业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精神，对于今天为祖国昌盛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人们来说，不是更具有伟大的现实教育意义吗！

荀况，战国时期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利用藏书进行著述和授徒。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韩非、李斯、毛亨、张苍都是他的学生。荀子十分重视对民教育，在教育内容上特别强调乐教。《荀子·劝学》说：“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他在音乐教育中提出用正当健康之音乐——“正声”抵制低级庸俗之音乐——“奸声”。此外，他还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把能否尊师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荀子大略》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所以，“振兴民族在教育，振兴教育在教师。”的提出正说明国家对教师的重视和信任。

战国后期，私学更加兴盛。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中牟之民弃田圃随文学者邑之半”，晋国人“弃商贾而学士者”也占四分之一。秦始皇焚书坑儒，

而我国典籍未被灭绝，古代文化得以流传，功劳也多在于当时的私人藏书。《史记·六国年表》说：“《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

两汉时期，私人藏书又得到迅速发展。当时的博士，学者和一些官吏，为了诵读、解释、教学与研究之需要，进行重点藏书以备自用。因此，私人藏书较为普遍。最著名者应属东汉大学者蔡邕，家中藏书近万卷，并编写了《黄初篇》作为当时的识字课本。汉代的博士是太学教授的通称，职掌文化教育。除负责议政，制礼和藏书外，还具有国家教授的职能，专门负责某一经典学派的知识传授。由于私人藏书的发展，私学也很发达。经师大儒多用自身的丰富藏书聚徒讲学，也有一些儒一面做官，一面收录弟子讲学授徒，尤其东汉私学更盛，学生人数一家常有数百，有的多达数千。牟长任博士及河内太守时，受学诸生常有千余人。东汉名儒马融教养诸生常有千数。郑玄游学归里，学生相随数百千人，晚年远道来学者数千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发展较快，活动内容也很丰富。这一时期，藏书达万卷以上的人已不在少数。较为有名的有，魏人王弼藏书近万卷，两晋人张华有书三十乘，北齐人辛术鸠集典籍万余卷。这时期的藏书家一边藏书，一边著述，以藏书增长学识和传授知识。同时，很多藏书家还从事借阅活动。《三国志·蜀志·向朗传》说：“蜀人向朗聚集篇数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晋书·范平传》描述两晋人范蔚的藏书：“远近来读者百余，蔚为办衣食。”《南史·崔慰祖传》记载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他们以优质的服务发挥着藏书教育作用。正因私人藏书之发展，虽长期战乱，学校废置无常，官学数量大大减少，而私学之风并未稍减，宗族家庭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晋书·孝友传》中记述，王延于农桑之暇训诱宗族；刘殷七子，五子各授一经，另二子公别授以《史记》和《汉书》；东晋王羲之教授子弟书法；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当时家庭教育的代表作，他主张教育应从幼儿做起。《颜氏家训·勉学》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想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并要求审慎地选择和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他在《慕贤》中说：“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肆，久而自臭也。”这一思想在改革的今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如韦逞母宋氏继承家学《周官》音义，在战乱中教学不辍，号宣文君。

到了隋唐时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读书人急剧增多，私人藏书又有新的发展。不仅藏书家增多，藏书数量也显著增加，且专藏大为发展。苏弁、韦述藏书均达二万卷，王涯“家书多与秘府侔”，韩王李元嘉“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柳公绰“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李泌藏书三万余卷，田弘正“起楼聚书万卷”，开私人造楼藏书之先河。随着私人藏书之兴盛，私学也普遍发展，不少藏书家和未取得功名前的学

者都聚徒讲学。如尹知章拜国子博士，下朝归家，仍讲授不辍。

由于雕版印刷的盛行，宋朝以后，私人藏书更为普遍，藏书数量一般都在万卷上。著名者有宋朝宋敏求书三万余卷；王钦臣藏书四万三千卷；司马光藏书万余卷；南宋叶梦得藏书三万卷，明代宋濂藏书数万卷；清朝张金吾藏书八万卷，号称“爱日精庐”。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私学之设比比皆是，有“乡学”、“村学”和“私塾”，因以授书、背书、写字为最基本内容，故统称为“蒙学”。还有一种较高程度的私学称为“经馆”。耐德翁《都城纪胜》记载：“都城内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很多藏书家受聘到私学去任教或自设书院进行讲学。

4 封建时代的官府藏书与教育

据前述可知，秦汉以前尚未设置专门的文化教育机构，称之为“庠”、“序”、“学”的学校也只是在进行军事、生产、渔猎、生活等教育过程之中伴以文化知识的教育。而专门文化知识的教育却是当时藏书机构的一项主要活动内容。秦朝统一中国后，藏书与教育完全统于官府，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颁挟书令”，禁止私学，以消学校。秦朝御史张苍“主柱下方书”，掌管秦宫廷藏书，并备有学习查问之责，将藏书与教育集于一身。

汉朝吸取秦之教训，采用儒家主张，儒经受到极大尊崇。于是整理古籍，厘定文字，开创太学，大力发展教育。《汉书·艺文志》说：“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书之府。”百年之间，出现了“书积如山”的盛况。通过这样大规模搜集和整理祖国典籍文化的活动，也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初创太学，置博士弟子五十人，至成帝时，太学生已增到三千人。东汉质帝时（公元146年），太学生数量就达三万多人。汉代官学比较发达，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时，就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学制系统。

我国正式设立专门的文化管理机构始于东汉中期。桓帝刘志初设秘书监一官，其职责是典司图籍，并负有著作、校讎和刊正之责。到晋氏始设秘书寺，不久即改为秘书省，以后各朝均因此名。只是在明代时，为加强皇权势力，将其并入翰林院。秘书省本来是专门掌握文化的机构，一开始就成为官府藏书的重要场所，但秘书省内也设有教师和学生。《隋书》卷二十八《百官下》记载：“秘书省，监、丞各一人领著作、太史二曹其历、天文、漏刻、视，各有博士及生员。”显而易见，秘书省既是官府藏书的地方，又是文化管理机构，除管理典籍外，还掌管文化知识的教育工作，并直接从事教学活动，故多以宰相兼领秘书监。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制上》记载：“凡学六，皆隶国子监。”由此可见，国子监是我国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构最高学府。为晋武帝最先所创，名曰国子